

評介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林本原*

一、前言

隨著美蘇相互對抗的終結，冷戰時代的若干議題，例如美蘇衝突、中蘇同盟等一連串問題，與冷戰發展相關歷史事件中，朝鮮戰爭無疑是值得注意的課題，伴隨著資料解密與公布國家解密相關檔案，如1976年～1984年，美國國務院編輯《美國對外關係》朝鮮戰爭時期的《美國對外關係》(FRUS)公佈關於朝鮮戰爭的美國檔案文獻。如美國學者約翰·路易斯·蓋迪斯(John Lewis Gaddis)新近出版《我們現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戰史》的論著，進一步闡述「新冷戰史」，重新探討國際冷戰，主張運用多國檔案進行冷戰史研究，逐漸擺脫以往美國對外政策為中心，使冷戰成為國際史研究範疇，但是仍將冷戰責任歸罪於斯大林與蘇聯，也引起學者廣泛討論¹。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¹ 陳兼、余偉民，〈冷戰史新研究：源起、學術特徵及其批判〉，《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頁6。



中國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彭德懷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毛澤東軍事文集》等文獻，公佈大量關於中國出兵朝鮮問題的電報、報告等。同時中國還出版了一批回憶錄和訪談錄。伴隨著重要文獻資料的發表，國際學者開始研究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問題。

之後俄國也發表了大量的回憶錄，包括在蘇聯政治避難的前北朝鮮高級領導人，如朝鮮人民作戰部長俞成哲(Yoo Songcho)、內務省副相姜相浩(Kang Sangho)、駐蘇大使李相朝(Lee Sangcho)、朝鮮勞動黨處書記林隱(ImUn)等人，以及參與朝鮮戰爭的蘇聯外交與軍事人員，如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T.F.Shtykov)、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M.S.kpitsa)、第 64 防空集團軍司令洛博夫(G..A.Lobov)、擔任朝鮮軍事專家領導工作波爾特尼科夫(G..Poltnikov)、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Nam Il)的首席顧問索濟諾夫(V.D.Sozinov)等人²。俄國開始解密關於 1949~1953 年朝鮮戰爭問題的大量檔案，包括史達林與金日成、史達林與毛澤東之間，蘇聯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與蘇聯在北京與平壤的代表之間的往來函電。特別是蘇聯解密檔案，為學者研究提供豐富的史料，新的原始檔案主要來自於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及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軍事檔案館。藉由跨國性冷戰史研究與學術交流，史料相互分享與召開學術研討會，使得最近十年冷戰史也成為國際學者研究的重點。

² 沈志華，〈朝鮮戰爭研究綜述：新材料和新看法〉《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頁86。



值得注意的是，美蘇冷戰對抗中重要一環的亞洲，特別是中國對於冷戰史研究與探討，與美、俄學者研究成果相比更是寥寥無幾。直到近年來中國研究冷戰史才有所突破，冷戰時代氛圍下圍繞在亞洲「熱戰」，如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更是引起學者注意。而本書也正是運用大量俄國檔案館解密文件、訪談記錄與回憶錄，並且放置中蘇關係歷史脈絡下探討朝鮮戰爭。

作者沈志華於 1982 年肄業後離開學術界，到南方經商，故沒有任何學歷和學術職稱。1991 年返回北京，成立民間歷史學研究機構，並在中國史學會下設立東方歷史研究出版基金，一方面資助史學專著出版和其他學術活動(已經資助出版史學專著 70 餘部)，一方面繼續從事蘇聯史、中蘇關係史的研究。1996 年被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史研究所聘為特約研究員³，一向關切冷戰時代國際史研究範疇，發表相當多論著，專書如《史達林與鐵托——蘇南衝突的起因及其結果》(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年版)、《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而其中又以中蘇關係、朝鮮戰爭等課題為研究重心，如〈朝鮮戰爭爆發的歷史真相〉(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0 年 2 月號)、〈中蘇結盟與蘇聯對新疆政策的變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2003 年版)同時也對於俄國解密檔案運用與掌握嫻熟，撰寫如《關於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中蘇關係的俄國檔案文獻》，(《世界歷史年刊》1997 年)、《關

³ 燕南學術、文化、思想、評論參見網址<http://www.yannan.cn>



於毛澤東與史達林的會談：俄國檔案文獻》，（《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等介紹蘇聯解密性檔案文字，新近出版《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92），為作者將蒐羅俄國解密檔案譯成中文，提供學人進行研究。且與楊奎松、齊德學編譯《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觀點》（軍事科學院，1996）收錄中俄等國學者研究論文二十七篇。

二、內容概要

探討中蘇同盟與朝鮮戰爭之間是否聯繫？為何種的聯繫，研究冷戰史的學者以此角度作為切入點，但是往往是結論聚訟紛紜，以豐富詳瞻多國檔案作為基礎。本書章節安排大致上以中蘇同盟作為思考主軸，以朝鮮戰爭作為討論範圍，共分五章，除此之外餘論則是收錄作者發表於若干歷史雜誌的文章，內容大致為蘇聯援華、中蘇條約談判、中國出兵是非得失等文章。

以下介紹各章節主要論點如下：

導言

本書從中蘇關係角度考察朝鮮戰爭的歷史，首先從歷史背景分析蘇聯原先基於國家利益的想法，制訂遠東政策。隨著中國共產革命獲勝，才改變對華政策，最後結成戰略同盟。然而蘇聯因試圖維護遠東戰略利益，重新決定對朝鮮問題的方針。最後作者企圖回應其他學者，認為朝鮮戰爭



並非為斯大林與毛澤東共謀理論，而且作者指出朝鮮戰爭將原先分歧的中蘇雙方，從原本形式上同盟轉而成為實質的同盟。然而針對共謀理論作者在此並未指出回應對象，若就作者其他相關論著⁴觀之，對象主要是日本中島嶺雄《中蘇衝突的起源與朝鮮戰爭的國際背景》(載於澳大利亞《中國季刊》，1979年第1期)一文把這類觀點歸納為北京—莫斯科—平壤共謀理論。再者就是韓國學者與傳播媒體，如韓國高麗大學朴明林《韓國戰爭的爆發和起源》的博士論文，關於朝鮮戰爭的蘇聯檔案公佈後，韓國更出現了「東亞共產主義三角同盟」理論，認為朝鮮戰爭及中國出兵為毛澤東、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預謀，傳播媒體如中央日報的編輯手法顯示此一觀點。

第一章「重溫遠東夢—蘇聯的遠東政策與中蘇同盟的起源」

作者檢視前人研究斯大林的對外政策，不外乎為具有侵略計畫擴展勢力範圍，其次採取防禦政策。又或者是蘇聯外交是古怪、反覆無常。或是蘇聯對外策略保戶既得利益與勢力範圍，僅有中國共產革命成功後，中蘇同盟才導致美蘇對抗。對於上述前人研究成果，作者認為無法全面、準確勾勒戰後蘇聯外交政策、對外政策的本質。作者認為蘇聯對外三個層面，為和平共處、世界革命與國家安全利益，以國家安全利益為最高指導原則(頁 25)。戰後蘇聯與西方爭端首先在東歐問題，蘇聯以集團對抗作為

⁴ 如沈志華，參見網址<http://www.usc.cuhk.edu.hk>《中国被迫出兵朝鲜：决策过程及其原因》



主要模式，而亞洲則是歐洲策略的補充與輔助，而並未完全或整體同時隨歐洲的變化而變化。作者也注意到三八線作為美蘇朝鮮半島受降、軍事佔領的界線，認為斯大林的特殊考量，希望藉此交換日本三八線以北的區域，然而此想法為美國拒絕(頁 36~37)。

第二章「走向莫斯科—中蘇同盟的基礎、目標與條件」

1949~50 年中蘇同盟，主要體現在對美政策以及如何解決各自的實際利益。毛澤東需要蘇聯的援助，藉以「解放」全中國，而蘇聯一方面借助中國遏制美國勢力在亞洲擴張，一方面避免蘇聯陷入中美軍事衝突。作者以米高揚在西柏坡進行會談為開端，會談的重心討論中蘇關係、蘇聯對中共提供經濟與軍事援助，以及中國國內政策和發展道路的問題，然而中蘇爭端集中於東北問題、蒙古問題和新疆問題。雖然此次會談沒有解決實際問題，但是因斯大林、毛澤東、米高揚電報往返，彼此認識到觀點分歧、差異，為中蘇同盟奠定基礎(頁 108)。除此之外，作者也注意毛澤東簽訂新的中蘇同盟條約，而非如其他俄國學者所言毛澤東來莫斯科目的為養病(頁 108)。由於中蘇同盟建立的緣故，蘇聯放棄先前雅爾塔體系與遠東策略，使原先攫取的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不復存在，因此僅能在朝鮮半島中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與濟州島等港口，將其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趁機將蘇聯的歐洲部分與太平洋出海口相互聯繫(頁 150)。作者留意到關於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毛澤東、斯大林並非一開始達成一致意見，而是產生爭執，且蘇聯無意改變條約的任何條款。蘇聯因應國際局勢變化的因素，才決定與中國簽訂新中蘇條約。學者韋司塔根據蘇聯檔案提出解釋為



多數蘇聯領導人認為如毛澤東沒有簽訂新條約，會損害他本人與政黨在中國地位(頁 140)。而作者解讀為英國、印度等國打算承認中國的原因，對於蘇聯而言是刺激，因此斯大林決定讓步(頁 139~140)。

第三章「越過三八線—斯大林對東亞國際局勢的思考」

在 1950 年初斯大林與毛澤東談論中蘇同盟，改變蘇聯對朝鮮半島的策略。作者檢視國際學者對此問題的討論，尤其是對於「因應國際局勢變化」說法的解讀。作者也試圖解釋斯大林為何突然改變朝鮮問題決策，動機是蘇聯也認識朝鮮半島的戰略地位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蘇聯與中國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同盟條約也迫使斯大林放棄 1945 年以降得到大部分政治、經濟利益。因此蘇聯為因應「國際局勢變化」，維護遠東利益，才確定同意北朝鮮採取軍事行動(頁 180)，同時也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為斯大林朝鮮問題決策的出發點(頁 193)。

第四章「跨過鴨綠江—中蘇同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

與蘇聯原先預期不同，美國決心介入戰爭，蘇聯不能公開捲入衝突，因此中國是否同意援助北朝鮮，考驗中蘇同盟。斯大林一度考慮放棄朝鮮，而中國卻相反參與朝鮮戰爭，前人研究認為出兵原因一為毛澤東基於國家安全利益，防禦敵人於國門之外的戰爭。一為出於革命的信念與意志，渴望戰勝美國，藉以提高中國國際地位(頁 248~249)。作者特別指出的是，對此問題可以從中蘇關係角度進行思考，出兵既非僅是滿足斯大林



要求，而是鑑於 1945 年斯大林利用對日作戰的藉口，佔領東北，因此若讓朝鮮戰爭擴大，蘇聯或是美國將會再度控制東北，有鑑於此毛澤東才毅然決定出兵朝鮮(頁 249~250)。

第五章「邁上新台階－在戰爭中全面合作的中蘇同盟」

作者從中蘇同盟相互理解與合作角度論述中國與蘇聯的同盟關係(頁 261)，毛澤東決定出兵後，斯大林命令蘇聯空軍掩護中國軍隊後方與運輸線，而非原先預定兩個月後才進行空軍支援。蘇聯也提供中國軍事與經濟援助，派遣大量經濟專家恢復社會經濟生活與邀請中國專家赴蘇學習，鞏固與擴大中蘇經濟關係(頁 276~277)。本書最後談論中蘇戰場中協調與統一，當三八線陷入僵局，毛澤東、斯大林協調停火主張，並且贊成停戰談判正確性，此後到斯大林去世為止，關於戰爭的問題中蘇始終保持協調和統一的立場，為中蘇同盟奠下基礎。作者認為因斯大林外交手腕，以及崇高的威望使得中蘇關係在一開始，中國就處於被動、服從的角色，也為日後中蘇同盟關係隱藏分裂因素(頁 290)。

三、簡評

以上大致為本書內容概要，接著下來就本書研究角度、史料運用與本書編輯略述申論如下：

本書以蘇聯國家安全利益作為起點，進而探討蘇聯遠東政策，以及日後導致朝鮮戰爭的遠因。作者特別提及三八線劃分問題，與蘇聯企圖藉



此交換日本三八線以北的區域。然而令人深感遺憾的是，作者並未就此深入剖析日本與蘇聯國家安全利益相互聯繫，個人以為蘇聯國家安全利益顯露在 1945 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抑制日本也是重要考量之一，因此蘇聯有意對日本進行分區佔領，藉以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因為美國強力拒絕蘇聯分區佔領日本要求，蘇聯僅能退而求其次，將目標轉向朝鮮半島北部。本書利用大量引用中文文獻 47 種、俄文 5 種解密檔案與英文文獻 10 種，論著及回憶錄中文多達 200 種之多，俄、英文多達數十種之多，史料運用不可不謂豐富。然而在史料運用方面，個人覺得仍有若干問題。作者論述中國對蘇聯而言可能是「雙刃劍」，一方面擴大蘇聯在亞洲的安全防禦地帶，另一方面中國一旦強大對蘇聯安全利益產生威脅(頁 176)。然而就本書提及中蘇關係「雙刃劍」的比喻，尤其是「威脅」作者並未進一步闡釋，殊為不當。首先國際局勢變化，蘇聯有意將中國納入社會主義陣營之中，因此不得不放棄 1945 年以降得到政治經濟利益，特別是遠東戰略利益，彷彿視中國與北朝鮮為其穩固遠東利益的基石。且在朝鮮戰爭期間提供軍事、經濟援助(雖然日後引起中共抨擊)，或許可以說是斯大林疑心中國走向鐵托道路，即使是如此也無法說明蘇聯曾經將中國視為威脅的說法，恐難成立。本書第 58 頁，提到與馬利若夫斯基(Malinovskii)元帥在東北行轅參加會談的中方代表應為張嘉璈，本書將名字誤植為「張嘉」。本書編輯所用的部分照片、圖片，也並未註明其出處。儘管本書仍有值得商榷之處，這是作者對於冷戰史研究的一系列著作中的重要成果，陳述朝鮮戰爭中的中蘇同盟演變的認識和理解。但就整體而言蒐羅檔案文獻，行文組織架構並無大缺失，本書的付梓對於冷戰國際史、中蘇關係研究範疇貢獻良多，



爲值得一讀的佳作。

(本文於 2004.4.8 收稿，2004.5.14 通過刊登)

